

《论语》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张一帆

(格拉纳达大学 文哲学院 西班牙 格拉纳达 18011)

[摘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正式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论语》全译本超过了十五种,早期译本皆转译自以英、法语为主的欧洲语言。80年代以来相继问世的直译本在翻译质量、学术价值、传播潜力等方面明显优于其他转译本,反映了《论语》在西语世界从转译本一家独大到直译本后来居上的翻译出版态势。文章分为五个部分,意在梳理西班牙语世界《论语》的译介与传播情况,着重从译者资历、译本特色、传播现状等角度入手分析介绍了佩雷斯版、苏亚雷斯版和常世儒版三个由中文直译的西文版《论语》,并在此基础上就《论语》在西语国家的进一步推广传播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论语》; 西班牙语; 翻译; 海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1]02-0094-06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1.02.014

《论语》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可追溯至16世纪末期。1590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将包括《论语》前两篇在内的“四书”西文译稿^①呈献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手稿至今保存在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该手稿被认为是儒家经典外译为欧洲文字的第一次尝试,比1687年首次于欧洲出版的《论语》拉丁文译本早了接近一百年。^②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高母羨(Juan Cobo)、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传教士的不断求索,使西班牙成为彼时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但在此后的几百年,特别是从19世纪开始,随着西班牙国力的大幅衰落,汉学研究在西语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沉寂。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西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存在明显的滞后。至20世纪初,理雅各(James Legge)、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汉籍欧译三大师”执笔的英、法、德文版《论语》权威译本相继出版。与之相对的是,首部直接翻译自中文的西班牙文版《论语》直到1980年代才问世。

一、《论语》在当代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出版情况

《论语》在西语世界有规模的翻译和出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目前已正式出版的西文版《论语》全译本超过了十五种。^③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转译自英文或法文,并由西班牙出版社出版、推广。1980年代以前,《论语》普遍与《大学》《中庸》《孟子》等合为一册出版,少数版本还与《尚书》乃至《道德经》同册出版。早期译本中较具代表性的有:1954年何塞普·法兰·马约拉尔(Josep Farran i Mayoral)翻译的《关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中国四书》^④,胡安·贝尔瓜(Juan Bergua)与何塞·贝尔瓜(José Bergua)同年出版的《中国经典》^⑤,1968年

收稿日期:2019-12-06

作者简介:张一帆(1990—),男,山东济南人,格拉纳达大学文哲学院西班牙语语言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语言文化交流。

^①以明代《四书大全》为底本完成的部分翻译,包括《大学》《中庸》及《论语》前两篇。参见梅谦立、王慧宇《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②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主编,1687年于巴黎出版。内容包括引言,《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以及若干附录。该书为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此前一百年翻译与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参见梅谦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版本统计以翻译者为准。因绝大部分译本再版时仅对个别内容和参考文献进行勘正、补充或只对排版进行调整,译文无实质性改动,故不同版次的同一译本不再多次计算。若无特别说明,文中所列时间均为译本首次出版时间。笔者对具体版本进行评述时,以其初版内容作为主要参考。

^④Los cuatro libros de filosofía moral y política de China, vers. de Josep Farran i Mayoral, Barcelona: José Janés, 1954.

^⑤Los libros canónicos chinos, trad. de Juan y José Bergua, est. prel. y notas de Juan B. Bergua, Madrid: Ediciones Ibéricas, 1954.

奥里奥尔·费纳·桑格拉斯(Oriol Fina Sanglas) 出版的《四书》^①以及胡安·戈多(Juan Godo) 与海梅·乌亚(Jaime Uyá) 合译的《东方哲学》^②。其译者中不乏彼时西班牙翻译界与出版界的知名人士。这些转译本在六七十年代大都多次再版,有的甚至于近几年重新出版,如2010年出版的《孔子的四书》^③、2017年出版的《四书》^④。不过其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三个直译本及90年代以来推出的新一批《论语》转译本相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早期译作通常对翻译底本和标准避而不谈,部分书籍对参考文献没有任何交代,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大部分译本从何种语言翻译而来。正因如此,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不同译本往往具有两极化评价。一方面,对优秀译本给予积极而理性的回应。以《东方哲学》为例,在其出版仅一年后,赫拉尔多·莫利纳·奥尔蒂斯(Gerardo Molina Ortiz) 即在墨西哥《东方研究》(*Estudios Orientales*) 杂志^⑤的书评栏目中评介和推荐了该书,称尽管该译作在中文专有名词拼写及序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纰漏,但在西语世界中国思想经典直译本缺失的状况下,“为那些对中国古典思想怀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⑥。另一方面,则对个别译本的严谨性和学术性提出尖锐质疑,其中以对费版“四书”西文译本的批评尤甚。早在其首版推出后不久,墨西哥汉学家白佩兰(Flora Botton Beja) 就曾总结了该译本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译文“不仅充斥错译且时而多译或漏译整句”,章节划分“与中文原作间缺乏对应关系”,前言内容“极其肤浅”。^⑦但是,这种严厉的批评并没有使费译本的再版和销售止步不前,仅在1970年至2000年,费版“四书”西文译本再版重印就已超过十次,频次在所有译本中居首,而其内容则几乎不加改动地延续了三十年。1998年,也就是在白佩兰评论发表近三十年后,伊丽莎白·科尔西(Elisabetta Corsi) 在同一杂志刊登的书评中以《论语·为政》第四章为例,再次分析和强调了费译本翻译存在的严重问题,甚至指责其缺乏作为一般译著所应具有的“基本的严肃性与真实性”^⑧。

可以想见,作为儒家思想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载体,类似译本的大量存在已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西语读者对《论语》、孔子、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知产生偏差。因此,一部直接翻译自中文的《论语》优秀译本成为西语世界汉学研究者 and 一般读者长期而迫切的需要。这一局面最终被一位专注于中国古典思想研究并精通中文的西班牙青年学者打破。1981年,总部设立于马德里的丰泉出版社(Alfaguara) 推出了第一部从中文直接翻译的“四书”西文译本^⑨,译者华金·佩雷斯·阿罗约(Joaquín Pérez Arroyo) ,这部译作日后成为西语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儒家经典译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独立成册的《论语》逐步成为西语图书市场儒家经典翻译的主流,新译版本持续涌现。1997年,卡伊洛斯出版社(Kairós) 推出了安妮·艾莱娜·苏亚雷斯·吉拉尔(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翻译自中文的《论语——思考与教诲》^⑩。西班牙学者伊多娅·阿尔比亚加(Idoia Arbillaga) 曾在《中国文学翻译在西班牙》一书中将其与佩版“四书”西文译本评价为西班牙出版的最好的两部反映孔子思想的译著。^⑪200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常世儒教授完成的最新一版《论语》直译本^⑫,该译本是目前唯一一部由中国学者翻译出版的西文版《论语》。在直译本陆续面世的同时,转译本在出版数量上依旧保持领先。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新出版的《论语》转译本几乎无一例外地译自几部已获广泛认可的英译本,其

①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trad. de Oriol Fina Sanglas, est. prel. de Francisco L. Cardona y M.ª Montserrat Martí, Barcelona: Bruguera, 1968.

② *Filosofía oriental*, trad. de Juan Godo, trad., notas prologales y rev. de Jaime Uyá, Barcelona: Zeus, 1968.

③ *Los cuatro libros de Confucio*, trad., pról. y notas de Juan Bautista Bergua, Madrid: Ediciones Ibéricas, 2010.

④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trad. de Oriol Fina Sanglas, Barcelona: Ediciones B, 2017.

⑤ 由该国顶尖人文社科科研机构墨西哥学院主办,1966年创刊,1975年起刊名改为《亚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为西语世界首屈一指的亚洲研究学术期刊。

⑥ Gerardo Molina Ortiz, “JUAN GODO, JAIME UYÁ (tr.), *Filosofía oriental. Confucio. Lao-tse*. Colección Podium, Ediciones Zeus. Barcelona, 1968”, en *Estudios Orientales*, Vol. IV, Núm. 2 (1969), p. 245.

⑦ Flora Botton Beja, “CONFUCIO,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Edición a cargo de Francisco L. Cardona y Ma. Montserrat Martí, Editorial Bruguera, S.A., Barcelona, 1968”, en *Estudios Orientales*, Vol. IV, Núm. 3 (1969), pp. 365-366.

⑧ Elisabetta Corsi, “Confucio,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trad. por Oriol Fina Sanglas, Ediciones B (Biblioteca de Bolsillo), Barcelona, 1997”, en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Vol. XXXIII, Núm. 2 (1998), p. 420.

⑨ *Los cuatro libros*, pról., trad. y notas de Joaquín Pérez Arroyo, Madrid: Alfaguara, 1981.

⑩ *Lunyu: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 trad., intr. y notas de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Barcelona: Kairós, 1997.

⑪ 参见 Idoia Arbillaga, *La literatura china traducida en España*, Alicante: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2003, p. 77.

⑫ 《论语》,常世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封面或版权页也对这方面信息有了明确交代。1982年米尔塔·罗森博格(Mirta Rosenberg)转译自理雅各版和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版的《论语——与弟子们的对话》^①,1998年阿方索·科洛德隆(Alfonso Colodrón)转译自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版的《论语》^②,以及2009年奈斯托尔·卡布雷拉(Néstor Cabrera)转译自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版的《论语》^③就是其中的典型。

阿根廷诗人、翻译家罗森博格以英语文学作品西译见长,因在诗歌、翻译领域的成就,2003、2004年先后被授予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④和科内克斯语言文学成就奖(Diploma al Mérito - Premio Konex-Letras)^⑤。罗版《论语》1982年在西班牙出版后,1995、1997年又分别由安德洛墨达(Andrómeda)、NEED两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近几年亦曾有重印。尽管罗译本在学术性上无法与三个直译本相提并论,但它是极少数由拉丁美洲学者执笔并于当地出版的儒家经典翻译作品,整体上不失为一部严肃之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论语》在拉美地区的传播。总的来说,西语美洲地区对《论语》乃至中国思想经典翻译和出版的重视程度与西班牙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现今西语美洲学术界和读者主要参考和阅读的西文版《论语》,均是由西班牙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纵观1950年代以来《论语》在西语世界的翻译出版历程,可以说三个直译版本无论在翻译质量、学术价值还是在学界接受程度和引用频次方面,均整体优于转译本,代表了西语世界《论语》翻译的最高水平。

二、佩雷斯版:西班牙语世界传播最广泛的《论语》译本

华金·佩雷斯·阿罗约1944年生于马德里,1970年代初曾赴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并于淡江大学教授西班牙历史与文学;80年代中期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攻读硕士学位,从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回国后任教于马德里公立语言学校。丰泉出版社于1981、1982、1995年承担了佩版“四书”西文译本前三版的出版工作,这三版目前是西语世界最经常被引用和馆藏的“四书”译本。自初版起,《论语》就被安排在译本正文的第一部分,足见它在译者心目中的地位。佩氏并不讳言《论语》存在的“矛盾与疏漏”,但这位在儒学研究领域颇有心得的西班牙译者认为,这丝毫不影响《论语》成为“儒家思想基石之作”。^⑥

佩雷斯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之时,西班牙当代汉学尚处于发展萌芽期。他在“译者序”中指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广大西语国家之所以长时间缺乏对中国文化——这一“复杂而神奇、在空间和时间上均与我们相距遥远”,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完整、最独特、最持久的创造之一”——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正是因为其汉学研究体系的缺失。^⑦佩氏翻译“四书”前后用时近四年,在他看来,汉学在1970年代的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是相对新生的学科,来自西班牙与拉美的译者不得不面对没有足够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现实,这令他的翻译工作进展缓慢、充满艰辛。况且,因儒家思想内涵丰富而深邃,加之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该作品与英译本和法译本一样存在无法避免的问题。结合译者在“翻译说明”和“参考文献”中提供的信息可知,佩氏在翻译中同时参考了《新译四书读本》及理雅各版英译本与顾赛芬法译本,在翻译《论语》时还特别参阅了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的译本。^⑧

佩雷斯为《论语》在西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做了以下几项开创性工作:一是,采用直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将一系列儒学概念由中文准确地对应翻译为西文,并有针对性地选取“仁”“义”“礼”“孝”“天命”“君子”“小人”等三十多个核心词汇,将其中文写法、读音与西文释义汇编后加入附录,提升了译本的学术性。

①Las Analectas: conversaciones con los discípulos, trad. de Mirta Rosenberg, Barcelona: Adiax, 1982.

②Analectas, trad. de Alfonso Colodrón, Madrid: Edaf, 1998.

③Analectas, trad. de Néstor Cabrera, Madrid: Editorial Popular, 2009.

④由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颁发,旨在为北美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成绩突出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提供资助,以支持其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⑤由阿根廷科内克斯基金会组织评选,用以表彰在文艺、科技、体育等领域为阿根廷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为该国最负盛名的个人荣誉之一。

⑥Los cuatro libros, pról., trad. y notas de Joaquín Pérez Arroyo, Madrid: Alfaguara, 1981, p. XXXIX.

⑦参见 Los cuatro libros, pról., trad. y notas de Joaquín Pérez Arroyo, Madrid: Alfaguara, 1981, p. LXVIII.

⑧佩雷斯在“翻译说明”中明确自己使用的中文底本与理雅各、顾赛芬、韦利等人的相同,而译文的章节与段落划分则参考了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一书。但译者在此并没有交代某一具体版本,而是在“参考文献”的“底本”一段同时列出了谢冰莹等人编译的《新译四书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版)、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牛津大学出版社等数个版本)和顾赛芬的《四书》(台中光启出版社1972年版),并特别补充标明英、法译本含中文原文。由此可以推断,佩氏应参考了多个中文底本。

二是,通过前言对儒家思想及其产生与发展、孔子、《论语》进行全面而精练的评述,并为读者提供“注释”“名词解释”“译者说明”“参考文献”“中国历史年表”“春秋战国地图”等一系列附录内容,将学术研究和译文集于一册,改变了以往转译本对《论语》及儒家思想介绍浅尝辄止的局面。三是,统一使用汉语拼音拼写译本中的人名、地名、篇名,并别具匠心地引入普通话声调系统为其标调^①。佩译本问世前,转译自其他语言的西文版《论语》因翻译者不通中文且带有颇多主观色彩,译文质量参差不齐。除此之外,它们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以威妥玛式拼音为主的拼写方式,个别译本甚至存在专有名词转写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给西语读者尤其是那些有志于进一步了解、学习中文及儒家思想的读者造成了困惑。佩雷斯的原意,一方面是方便读者按音序查字法准确查阅感兴趣的中文字词,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声调区分译文中的同音字词。正是这一决定使佩版西文《论语》成为西语出版界率先以汉语拼音拼写中文专有名词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作之一,对《汉语拼音方案》在西语世界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严格地说,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思想经典西译作品,佩版“四书”西文译本也存在一定的遗憾。首先,佩氏在译注上着笔不多,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侧重于人物、地名与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文中疑难词句的阐释不足。佩版西文《论语》一百四十五条注释中,对关键词句的释义仅占全部注释的一半左右,且多较为简短。其次,前三版译文、目录、“名词解释”等部分皆存在一定数量的专有名词拼音调号标注错误。尽管译者于再版过程中不断订正,但直到1995年第三版推出时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佩版“四书”西文译本的面世正值西班牙高等院校汉学研究及汉语教学活动起步的重要阶段,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该书的《孟子》《大学》《中庸》一并成为西语世界传播最广泛的儒家经典翻译作品,并长期作为学术界首选译本应用于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包括佩德罗·圣吉内斯(Pedro San Ginés)、高遁(Sean Golden)、达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多洛雷斯·弗尔克(Dolors Folch)等在内的西班牙当代汉学领军人物,都曾推荐或引用过该译本。此外,佩版“四书”西文译本亦成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格拉纳达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等西语世界汉学教育研究重镇中国思想文化科目的教学参考用书,成为一批批高等院校汉学专业学生和众多对中国思想、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西语读者了解、研习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读物。^②

目前,佩译本已先后由丰泉出版社以及巴塞罗那的读者圈(Círculo de Lectores)、RBA、帕伊多斯(Paidós)等数家出版社出版、再版合计九次。1999年,读者圈出版社还曾专门推出过独立成册的佩版西文《论语》。^③而在西语美洲地区,除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的国家图书馆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等拉美各国顶尖学府的图书馆均藏有至少一版佩译本可供借阅。

三、苏亚雷斯版:简洁凝练、力求贴近原作的《论语》译本

安妮·艾莱娜·苏亚雷斯·吉拉尔是西班牙当代知名翻译家,1960年出生于巴塞罗那,父亲是西班牙作家、导演贡萨洛·苏亚雷斯(Gonzalo Suárez),母亲是法国人。苏亚雷斯1981年进入巴黎七大攻读汉学本科和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6年赴北京大学学习汉语,2009年凭借对杜甫诗歌西译的研究获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博士学位,并曾在该校教授西汉翻译十余年。苏氏在中西和法西翻译领域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尤其精于唐诗西译,翻译出版了李白、苏轼、王维、白居易等人的多部诗词选集。不仅如此,她还于1998年翻译出版了《道德经》,该译本与杜善牧(Carmelo Elorduy)、毕隐崖(Iñaki Preciado Idoeta)等西班牙汉学大家的版本并列列为最受学术界认可的西文版《道德经》。

苏氏在译本前言中开篇写道,引言的目的是介绍孔子而非日后在封建社会中“随时代和权力的需要逐渐教条化、不断被改造的儒学”。她同时指出,《论语》是一部“篇幅有限、内容与风格不尽统一的断片的集合体,有疏漏,有矛盾,也有或因笔误造成的令人费解的地方”,此外,“因多数章句缺乏具体的语境,加之数不胜数的后世评注,使翻译工作难上加难。然而,它却是唯一一部能让我们隐约窥见孔子人格与思想的作品”。^④苏亚雷斯使用的主要底本是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四书集注》,今译和注释方面参考了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版)、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匡亚明先生

^①佩雷斯对所有阴平声调采取了不标调号的处理方式,其本人在“翻译说明”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②在格拉纳达大学执教中文和中国思想超过四十年的圣吉内斯教授告诉笔者,佩译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很好地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自己多年教学过程中讲解儒家思想时主要使用和推荐的就是这个版本。

^③Analectas: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 ed. de Joaquín Pérez Arroyo, Barcelona: Círculo de Lectores, 1999.

^④Lun yu: reflexiones y enseñanzas, trad., intr. y notas de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Barcelona: Kairós, 1997, p. 9, p. 27.

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等几部当代儒学研究领域权威性文献。译者也参考了其他多种《论语》译本,其中就包括佩雷斯版西译本和程艾兰(Anne Cheng)版法译本,以及佩氏同样参考过的经典英、法文译本。苏译的最大特色是在保证用词准确、自然通顺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了中文原句的结构和语气,这与译者多年来所践行的翻译理念有直接关系。苏亚雷斯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她认为努力还原作品行文风格与精神内涵,即在贴近原文基础上做到形神兼具,是翻译所应遵循的最重要原则。^① 值得一提的是,苏氏在译注部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文中的专有名词,特别是孔子的众多弟子、儒家思想基本概念以及一百多条意涵深刻的词句一一进行了梳理和解释,并在每条注释后列明该词句出现过的所有章节。此举在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文的同时,大大提升了译本的学术参考价值。

苏氏在将儒学概念译为西文时倾向使用同一对应词,例如将“仁”统一译为“humanidad”、将“道”统一译为“vía”、将“礼”统一译为“ritos”。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中“仁”“道”“礼”三字分别出现了109、60、74次,这些词在不同语境之下含义亦有不同。^② 相较于译文,译者更希望通过注释对上述概念的丰富内涵加以呈现。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追求形式统一而相对缺少变通的翻译策略,难免会使读者对部分内容的理解产生偏差。

2006年,兰登书屋蒙达多利出版社(Random House Mondadori)非正式再版了该译本的汉西对照版。^③ 译者前言中存在的专有名词(如“春秋”“子贡”“鲁”)和儒学概念(如“仁”“君子”“天命”)加注了繁体中文写法,并新增了一部分参考文献。该版装订考究、排版精良,但是印数不多,传播极为有限。苏版《论语》西文译本自出版以来,在近十五年的学术发表中被引频次不断提高,并经常与佩译本并列于科研与教学参考文献中,这就充分体现了西语国家学术界对它的认可与肯定。

四、常世儒版:细致考究、语言功底深厚的《论语》译本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常世儒教授是国内资深西班牙语专家,在翻译教学和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对外汉语教学在西语世界的宣传与推广,已在西班牙出版多部中国文化专著,并翻译出版了《论语》《唐诗三百首》等重要作品。常版西文《论语》为汉西对照版,隶属“大中华文库”丛书,底本采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杨逢彬教授在前言部分曾对此有专门说明。^④

常版在对《论语》中的高频词如“仁”“礼”“信”“道”“德”等进行翻译时,往往不拘泥于某一特定词语,而是根据其内在含义和具体语境的不同使用多个西文对应词加以诠释。如译者所言,“‘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中国伦理道德体系中的‘礼’‘忠’‘诚’‘恕’‘中庸’等其他概念均建立在‘仁’的基础上”^⑤,因此,仅在“仁”的翻译上,他就采用了“benevolencia”“virtud”“bondad”“virtud humanitaria”等若干种译法。这一基于对儒学核心概念深入理解所采取的某种变通,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论语》翻译的难度之高。在附录部分,译者对孔子生平及其生活年代进行了简要介绍,附加了近一百五十条注释,在此基础上又另辟“名词解释”一节,详细讲解了“仁”“道”“信”“孝”等十几个核心词汇,最后将专有名词、儒学概念及部分读者难以理解的词汇编为中西“译名对照表”,并注明其所在页码。常译风格平实严谨,附录内容周密详尽,双语对照模式也为西语国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者与爱好者深入学习《论语》提供了条件。

杨逢彬教授在该译本前言中写道,“今天,《论语》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它的总印数仅次于《圣经》,而高于其他任何一部畅销书,”可是,“目前令人满意的西班牙文译本尚付阙如”。^⑥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佩译本、苏译本以及其他诸多转译本代表的是西语国家乃至西方世界汉学家、翻译者对

^①参见2009、2012年分别刊登于加泰罗尼亚作家协会与“在中国”网站对译者的访谈“Anne-Hélène Suárez: La labor del traductor sufre de la inconsciencia total que de ella tienen los lectores”, 12.03.2009, <http://www.acec-web.org/SPA/ARTICLE.ASP?ID=174>, última consulta: 22.02.2020; “Anne Hélène Suárez: Los libros chinos que llegan a España no siempre lo hacen por sus méritos literarios”, 24.05.2012, <http://www.zaichina.net/2012/05/24/anne-helene-suarez-los-libros-chinos-que-llegan-a-espana-no-siempre-lo-hacen-por-sus-meritos-literarios/>, última consulta: 22.02.2020.

^②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293-294、311页。

^③*Lunyu (edición bilingüe)*, intr. y trad. de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Barcelona: Random House Mondadori, 2006.

^④参见《论语》,常世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⑤《论语》,常世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⑥《论语》,常世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论语》的理解和诠释。常译本作为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全本翻译出版的西文版《论语》,打破了长期以来儒家经典在西语世界译介与推广多由海外人士完成的“被动”局面。

尽管如此,常版西文《论语》目前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情况并不理想。一方面,该版问世至今刚满十年,而一部优秀的中国思想经典外译本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为自己“正名”;另一方面,相比佩译本、苏译本,常译本的借阅、购买渠道匮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在一般西语读者中的传播。利用世界上最大的书目记录数据库 WorldCat 检索并对结果信息逐条确认可以发现,截至 2020 年 2 月,西语国家中仅四家位于西班牙的图书馆分别藏有一部常译本可供借阅,也就是说,该书在西语美洲国家主要图书馆的馆藏为零。基于上述原因,它的学术价值同样有待学术界和评论界进一步探讨、挖掘。事实上,常版西文《论语》海外传播陷入困境绝非孤立现象,这也是国内出版机构中国文学作品西译本发行与推广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

五、对提升西文版《论语》海外传播的思考和建议

认知是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论语》西译同西语世界中国文学作品持续增长的翻译和出版趋势相一致,是中西、中拉人文交流日益活跃的具体体现。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全世界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and 地区超过二十个,母语使用人数接近五亿,面对如此广泛的受众群体,《论语》整体传播情况难言成功,或者说如同其他大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一样,“并未在西语世界取得这些经典在国人心中应有的地位”^①。基于此,提升《论语》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应在充分考虑现有客观条件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

首先,创新交流合作机制,密切文化沟通往来。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班牙高等院校汉语教学蹒跚起步,发展至今已有超过十所公立大学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将中文作为正式教学科目,西班牙汉学家和出版社在中国传统经典进入西语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事实上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大学开始成立以中国研究为主线的东亚研究中心,客观上为《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西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与传播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空间。但目前西语学界对《论语》特别是其文本的解读仍旧十分有限,应进一步利用好中西、中拉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间的交流合作机制,在主要西语国家定期举办中国思想经典专题学术研讨会、《论语》系列讲座,支持鼓励西语世界教育和文化领域人士参与到《论语》及其译本的研究和讨论中来,以带动《论语》优秀译本在教学科研以及主流媒体中的使用与宣传,使其在专业人士、在校学生、一般民众中分层次逐步传播开来。

其次,对接知名出版机构,确保渠道精准投放。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从旨在系统地向海外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大中华文库”到 21 世纪以来启动的一系列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实现了《论语》《诗经》《儒释道与中国文化》等儒家经典及儒学研究西译本的出版或立项,体现了政府推动儒家思想向西语世界传播的投入与决心。但是,由于缺乏与海外图书市场的有效对接,译本传播的深入性和持续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加强同西语国家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借助其在西语读者中的高认可度及海外市场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使国内学者完成的优秀译本能够以授权出版或联合出版的方式进入到西语国家主流图书市场。2020 年 3 月,以哲学和宗教类书籍出版见长的西班牙赫尔德出版社(Herder)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同步再版了常版西文《论语》,在该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梁启超先生曾评价《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不断推进,作为深刻影响中华民族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形成、发展的基本经典之一,《论语》理应在中国传统经典走进西语世界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海外接受程度必将不断提高,并在西语世界中国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廖吉广)

^①许一飞《“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西译出版的回顾与思考》,《编辑学刊》2020 年第 1 期。